

第五章 新形勢中日關係的發展與挑戰

冷戰結束至今的中日關係與結束初期相比，其實已經有了不少的變化及發展，而本章所要探討的問題，便是在這些發展下，是否可能導致未來中日關係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或是更倒退。首先，在美日同盟方面，是否繼續選擇將中國視為潛在對手，或是將有一番新的面貌，而美國又扮演何種角色；其次，中日關係是否適合置於多邊對話機制之下，並以此方式來促進對話與維持區域和平穩定；最後，中國近來所倡議的「和諧社會」，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嚮往的「美麗國家」，是否有助於中日關係更加緩和，讓彼此能取得更大的利益，這些都是本章關注的焦點所在。

第一節 美日同盟與中國的未來

美國是影響中日關係相當重要的因素，而這又牽扯到美國整體亞太戰略。本節探討的議題主要有兩個部分，首先是美國對中國的交往策略，其次則是美日同盟關係未來可能的發展及挑戰。第一個部分將分析冷戰後到 George W. Bush 上台之後，美國對中國交往策略的轉變，以及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個部分則將對美日同盟的未來發展，是制中還是與中交往做一番討論。

一、美國對中國交往策略的轉變

冷戰結束後的 1991 年 11 月，當美國已打完第一次波灣戰爭而蘇聯正瀕臨解體之時，美國前國務卿 James Baker，以「扇形」(fan-spread) 戰略架構，解釋美國在冷戰後時代的亞太政策。在 Baker 的論述中，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以及由美國和其盟邦締結的雙邊軍事條約，所構成的「扇形」安全體系，將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三根骨幹。在「扇形」架構中，美國強調將以北美為「扇底」(base) 往西越過 (radiating) 太平洋，再分別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和澳洲之間的雙邊軍事盟約各形成為「扇骨」(spoke)，來構成「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佈

署，其中又以美日同盟為「核心扇骨」之所在(central support and key connection)，而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即是反映這些利益的組合。¹後來美國又陸續與願意提供後勤支援的新加坡、汶萊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簽約，更使這「扇形」安全架構具體的形成海洋勢力對於大陸勢力(尤其是中國)的包圍，若是再加上另兩隻骨幹，即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儼然成爲一幅完整的和平演變藍圖和行動。²這種以和平演變爲目標的「圍堵」特性，顯然與冷戰時期的「圍堵」不同，目的在防止對於區域安全或穩定的威脅產生或擴大，因此有人稱爲「軟圍堵」或是「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

1993年，美國總統 Bill Clinton 所提出包含「力量分享(shared strength)、繁榮分享(shared prosperity)、和對民主價值分享(shared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values)」等三大觀念所形成的「新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community)，³基本上也是承襲這種三位一體的「扇形」戰略構想，只是更強調美國具普世價值的民主政治及區域性多邊安全會議機制的建立。此外，他還提出「交往」(engagement)及「擴大」(enlargement)的戰略來取代冷戰時期的圍堵戰略，自此之後「交往與擴大」遂成爲 Clinton 對外戰略之核心。⁴而其主要目標有三項：1、以有效的外交及軍事力量強化美國的安全；2、增進美國的經濟繁榮；3、在海外推廣民主政治。

此外，時任國防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部長 Joseph Nye 也認爲美國在亞洲駐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爲美國對亞洲貿易額約 4,000 億美元，可維持 300 萬人的就業，⁵若美國撤軍將造成亞洲權力真空，而 Nye 也深知日本方面希望確定美國

¹ 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1992), pp. 4-5.

² 蕭全政，「論中共的『和平崛起』」，頁 12。

³ Bill Clinton, "Fundamentals of Security for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29(19 July 1993), p. 507. 轉引自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 (台北：生智出版，1999)，頁 83。

⁴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 (台北：生智出版，1999)，頁 46-47。

⁵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王友仁，*從美國戰略論冷戰後的東北亞危機-從朝鮮半島看當前台日美之戰略互動關係* (台北：中央研究院

未來對日安全政策的方向，因而積極主張改變 Clinton 對日本的安全政策，加強美日安保體制，最後在 1995 年提出「東亞戰略報告」，深刻影響了美國的亞太政策。報告的發表除了指出東亞地區存在的不確定性及不安定因素，也修正了 George H. W. Bush 時期以收縮兵力為主的戰略思想，並再次確認美日同盟的關鍵性作用及地位，這代表著美國對日戰略新階段的開始，亦結束了美日同盟自冷戰結束初期以來的漂流狀態。⁶

總之，Clinton 時期美國主要對中國採取交往的策略，兩國更在 1997 年和 1998 年經由兩度美中高峰會之後，底定「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並表明將基於合作與互利的關係，與中國進行「全面性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全面性交往」自然是先前「交往」與「擴大」原則之下的最佳表現，其目的是將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之內，試圖和平演變中國政權，而支撐「交往」的支柱便是由 Nye 在 1995 年開始所構築的美國亞太戰略。也就是說，美國不論對中國採取「交往」或是「圍堵」，以美日同盟為主體的海洋戰略線都是美國確保亞太海權的重要關鍵。

George W. Bush 上任後極為重視亞太的戰略地位及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影響，除了經濟理由外，亞太地區在冷戰後逐漸構成對美國安全的挑戰，也是重要的考量。美國前國防部長 Donald Rumsfeld 曾表示，美軍必須將軍事戒備的重心放在亞洲的朝鮮半島與中國地區，焦點的轉移並不代表美軍對歐洲的興趣降低，而是亞洲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升高。⁷因此，Bush 政府在亞太地區主要有 3 個目標：1、防止地區霸權國家的興起；2、維持穩定；3、控制亞太地區的變化。而在政治與軍事戰略上則由 4 個部份組成：1、深化並擴大雙邊安全聯盟，從而建立更加廣泛的伙伴關係；2、在亞太地區正在崛起的主要大國及關鍵性地區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和目前受到削弱的俄羅斯）間實行一種大國平衡戰略；3、

東北亞研究，2001），頁 3。

⁶ 楊伯江，「日美關係的漂流」，薛君度、陸忠偉主編，**顛簸的日本**（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頁 135-136。

⁷ Robert Burns, "Army Shifting Equipment to Asia," *Washington Post*, 30 August 2001.

關注可能誘發其他國家使用武力的局勢，如台海問題的控制；4、推動所有亞太地區國家展開內容更廣泛的安全對話。⁸總之，Bush 政府的亞太戰略基本而言就是「聯合盟友以制衡中國」，⁹具體作為則是以美日同盟為核心，來加強與其他雙邊盟友間的關係。

Bush 上台之後對中國的態度，不論是在全球或區域的層次上，均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國務卿 Condoleezza Rice 也認為美國在透過經濟互動而促進中國內部轉型的同時，也必須對中國採取圍堵，因為其可以憑自身的能力改變亞洲的權力平衡，換言之，美國在和中國合作的過程中，一旦與美國利益有所衝突，美國也必須不畏懼與中國衝突。¹⁰但美中之間有著複雜而深刻的戰略及經貿關係，¹¹於是產生了既合作又競爭的狀態，這種關係使得美國難以全面採取「交往」或是「圍堵」的方法，於是就有學者認為美國應該採取「圍和」(congame)的作法¹²，因為「圍和」可彈性調整為「圍堵」或「交往」、「伙伴關係」。

911 事件發生之後也給了美中雙方一個改善關係的機會，美國基於反恐的全球大戰略，需要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支持，身為世界主要強權國家之一的中國，更是美國爭取合作的對象，中國則基於其「和平穩定發展」的戰略考量，亦不願放過這個契機，美中關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從「戰略競爭對手」朝向「建設性合

⁸ Zalmay Khalizad 著，**美國與亞洲：探索美國的新戰略和兵力態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頁 2-3。

⁹ 王高成，「從小布希東亞之行看美國亞太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3 卷第 3 期（2002 年 7 月），頁 79。

¹⁰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Jan/Feb 2000), pp. 55-57.

¹¹ 黃奎博，「我國總統選後美中台三邊關係發展」，陳一新主編，**美中台關係戰略評估 2004**（台北：遠景基金會，2005），頁 11。

¹² 「圍和」(congame)由蘭德公司(Rand)首先提出。政策要素有三：1、美國需採修正式的「交往」政策，強化與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的關係，但不惜於批判中國不佳的人權紀錄，而對中國輸出核武技術或物資，更需使涉案的中國公司及個人付出代價；2、美國為嚇阻中國尋求區域霸權，必須加強與亞太國家的關係；3、對台灣未來定位採取「模稜兩可」(ambiguity)的立場，在中國未來發展不定的情況下，台灣維持現狀符合美國利益。可參見 Zalmay Khalizad, "Congage China," *RAND Issue Paper*, 1999, <http://www.rand.org/pubs/issue_papers/IP187/IP187.html>。

作關係」發展。¹³於是「建設性合作關係」成爲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新定位，雖然不似以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那般密切，但卻比「戰略競爭者」關係友善許多。對此，當時的國務卿 Colin Powell 便解釋，中美雙方應該「在能夠合作之處合作，在有歧見之處對話，而有嚴重歧見之處，雙方讓對方明瞭歧見的根源，從而尋求解決之道」¹⁴。

另外，911 事件後，美國也透過各種管道要求日本全力支持其全球反恐戰爭，於是 2001 年 9 月 19 日，小泉純一郎首相在內閣保安會議之後宣布日本的「支援美國」七點實施方案，其中 4 項是動用自衛隊配合美軍進行軍事行動，包括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敏感問題。¹⁵日本國會更於 2001 年 10 月 29 日，以反恐之名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以及「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等所謂「恐怖主義對策關連三法」。日本如此積極的作爲，除了能夠進一步得到成爲美國平等夥伴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可以將打擊恐怖主義視爲其邁向「正常國家」的墊腳石。

總之，911 事件後雖然美中關係由「戰略競爭者」朝向「建設性合作關係」調整，但弔詭的是美國仍將中國視爲潛在的威脅。像是美國在 2002 年的核態勢檢討報告中宣稱，不排除在必要時在特定國家或區域使用核武，包括台灣海峽的軍事衝突在內，這已隱約指出中國是美國立即或潛在的核威脅來源。¹⁶顯見美國在與中國開展「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同時，仍未忽視中國崛起對美國可能構成的

¹³ 許志嘉，*當代中國大陸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出版，2004），頁 233。

¹⁴ *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 19 日，11 版。

¹⁵ 7 項實施方案爲：1、派遣自衛隊協助美軍運送燃料、物資補給和醫療服務；2、動用日本自衛隊加強駐日美軍基地和重要設施的保安警備；3、調派自衛隊艦船到有關地區蒐集情報；4、加強出入境管制並與有關國家交換情報資訊；5、向巴基斯坦等阿富汗鄰國提供人道支援和難民救援；6、必要時調動自衛隊到巴基斯坦進行人道支援和難民救援；7、爲打擊恐怖主義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協調和友好合作。詳見小泉純一郎，「小泉內閣總理大臣記者會見錄」，**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01 年 9 月 19 日，〈<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919sourikaiken.html>〉。

¹⁶ 黃奎博、蘇雲紫，「911 事件之定位及其對全球安全的影響」，中華歐亞基金會，*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台北：大屯出版社，2003），頁 39-41。

威脅，¹⁷也就是說 911 事件後美中之間的戰略關係，仍擺盪在「敵人」與「夥伴」中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美中彼此仍處在「合作大於衝突、競爭大於敵對」的局面下。

二、美日同盟的未來

冷戰結束之後，美日同盟曾歷經多次重大變革。冷戰結束初期蘇聯的解體，導致美日間共同敵人消失，加上美日兩國在經濟貿易上有所摩擦，曾使得這個同盟關係面臨一種漂流的狀態。一直到 1995 年由 Joseph Nye 所主導的「東亞戰略報告」發表之後，強調爲了因應朝鮮半島的局勢及東亞地區的不安定因素，才再次確認美日同盟的關鍵性作用。從此之後，美日同盟的內容不斷擴充，包括 1996 年的「美日安保聯合宣言」，以及 1997 年的「美日安保新指南」等等，都持續在檢視兩國之間的安全合作議題，來配合國際環境和區域情勢的變遷，使雙方的軍事同盟關係得以應付新的挑戰。2000 年 10 月，由 Richard Armitage 及 Joseph Nye 等人所主導的「Armitage report」更指出，美國歡迎日本有更大的貢獻，使雙方能成爲更平等的同盟夥伴，並且也暗示日本憲法的相關規定，是美日同盟合作的障礙。¹⁸

Bush 上台之後，由於北韓核武危機與中國軍事力量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對美日所主導的東亞現狀秩序構成了很大的挑戰，因此美國一直鼓勵日本扮演更爲積極的區域安全角色，Bush 政府官員更有許多知日派人士不斷要求日本參與國際與東亞安全事務，這些都成爲美日同盟關係強化的基礎。¹⁹2001 年的 911 事件發生後，美中之間雖然由於反恐的原因而增加了合作，但是美日同盟的發展卻絲毫沒有停頓。日本方面爲了因應美國的反恐戰略，在事件過後不久隨即通過「恐怖主義對策關連三法」，更在 2003 年通過了「有事三法」。此外，2005 年 2 月，

¹⁷ 遠景基金會，**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台北：遠景基金會，2002），頁 197。

¹⁸ 蕭全政，「論中共的『和平崛起』」，頁 14。

¹⁹ 楊永明，「戰略清晰 東亞新局勢」，**國政評論**，2005 年 2 月 20 日，〈<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4/NS-C-094-028.htm>〉。

美日兩國於華府舉行的「二加二會談」，更將台海安全視為共同關切議題。同年 10 月底在華府舉行第二次「二加二會談」，又指稱美日同盟是亞太區域穩定的重心，未來更希望讓日本提升防衛能力與在亞太區域安全上負更大的責任。2006 年 5 月 1 日，美日再一次的「二加二會談」上，達成駐日美軍重整之最終協議，²⁰也讓自衛隊和美軍更趨一體化的來維持其軍事能力。

對於冷戰後美日同盟關係的不斷提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周邊國家自然會對這些舉動產生疑慮。而早在美日於 1997 年提出新安保指南時，就有學者指出，修改安保指南是一項兩難的工作，兩國除了對修改要有共識之外，更要面臨國內與國外的多重考量和壓力。²¹修改幅度若是過大，將使安保條約走向正常軍事聯盟關係，因而大幅增加日本的軍事安全責任與參與，一方面會遭到東亞國家的疑慮和反彈，另一方面也會面臨日本國內民眾的質疑與反對；反之，如果修改的幅度不夠，則將使安保條約無法應付未來的真實挑戰，美國政府也有可能在受挫之餘，修改其東亞安全政策。

美日同盟關係這種持續增強的動作，背後自然有驅使其前進的原因存在，除了朝鮮半島的危機之外，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提升的經濟實力，連帶使其綜合國力迅速高漲，造成中國崛起的現象。中國的崛起也代表著其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得到擴展，加上其日漸升高及不甚透明的軍費支出，都讓美日兩國憂心不已，而美日兩國的反應則表現在更趨緊密的軍事交流及合作，因此，美日同盟和中國就在這樣彼此缺乏互信的情形下產生「安全困境」的狀況。雖然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在冷戰後有相當快速的發展，且仍維持著高層互訪，²²試圖強化雙方在安全上的合作及互信，但在進入新世紀之後，雙方仍難以擺脫從權力和安全出發

²⁰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2+2」）の概要」，外務省，2006 年 5 月 1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g_aso/ubl_06/2plus2_gai.html〉；「再編実施のための日米のロードマップ」，外務省，2006 年 5 月 1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g_aso/ubl_06/2plus2_map.html〉。

²¹ James Shinn, "Testing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Current History*, vol. 96, no. 614 (Dec 1997), pp. 425-430. 轉引自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頁 281。

²² 雙方的高層互訪自小泉純一郎上任首相之後，由於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曾中斷 5 年多之久，後來在安倍晉三繼任之後，才又再度開啓。

的體系性安全困境結構，從而在現實利益上接二連三的產生摩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美日同盟與中國在未來究竟該如何相處，Christopher Twomey 就指出若要利用美日同盟來與中國「交往」是不大可行的，因為根據歷史經驗而言，同盟建立的目的是爲了要對抗外部的勢力，儘管美日雙方都宣稱不是針對中國而來，但在中國的認知上，美日同盟的一舉一動都看在中國眼中，對於同盟關係的提升自然容易被視爲威脅。²³對此，他認爲雖然利用美日同盟來與中國「交往」有其困難所在，但這不意味著要放棄「交往」的政策，而是應該利用其他多邊機制（例如 UN、ASEAN Regional Forum, ARF、APEC、WTO 等等），或者是藉由美日雙方各自的中國政策來達成與中國「交往」的目標。

此外，在多邊機制方面，David Lampton 和 Gregory May 認爲可以建制一個「東北亞區域論壇」（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Forum, NARF），來專門探討東北亞的安全議題。²⁴他們覺得雖然「東協區域論壇」也有類似的功能，但由於該多邊機制的成員中利益太過分歧，難以集中討論東北亞的安全議題，而藉由 NARF 的設立，則可以提供一個對話的場域，進而能使中日之間的關係得以緩和。

也有學者對於美日同盟的未來發展有不同的看法，Benjamin Self 就認爲應該藉由美日同盟來「交往」中國。雖然從 1995 年的「東亞戰略報告」以來美日同盟關係不斷升溫，也導致中國公開的反彈，但這是因爲美日同盟走錯了方向，加上 911 事件發生之後，更不應該採取與中國對抗的方式。因此，他指出美日同盟應該建立更穩固的機制：1、建立秘書處。藉由秘書處的設立來提供雙方領導人共同行事的場所，並且可以增加與其他盟邦的交流，進而更能與中國進行溝通；2、設立兩國國會的亞洲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 on Asian Security）來加以監督。

²³ Christopher P. Twomey, "The Dangerous of Overreach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China," in Benjamin L. Self & Jeffrey W. Thompson, ed., *An Alliance for Engagement: Building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2), pp. 3-29.

²⁴ David M. Lampton & Gregory C. May, *A Big Power Agenda for East Asia: America, China, and Jap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 2000), pp. 66-67.

在美日雙方關係漸趨緊密的同時，更應該在每個層面有更大的透明度，並藉由委員會的監督，來確保同盟關係不致走偏；3、需要更廣泛的雙邊防衛關係。爲了增進效率，雙方應該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以應付雙邊或區域的安全議題；4、秘書處應向其他多邊合作機制開放。要使中國遵守規則，必須與及他國家和多邊機制相互合作，光是美日自己單打獨鬥是不夠的；5、建立美日同盟與中國的「一加一對話」。這可以讓美日彼此的政策更加透明，也讓中國瞭解美日同盟將會繼續走下去；6、在核子議題上與「美日軍備管制、裁軍、不擴散考核委員會」（U.S.-Japan Commission on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Non-Proliferation and Verification）相連結。在這一點上雖然困難，但是若有一點進步，則更能提供一個就中國核武議題對話的基礎。²⁵最後，他認爲雖然這個想法很有企圖心，但他相信美日雙方可以藉由彼此長久的合作經驗，來達成這些目標，若是兩國仍舊自顧自的加強彼此的同盟關係，就只會增加中國的敵意而已。

²⁵ Benjamin L. Self, "An Alliance for Engagement: Rationale and Modality," in Benjamin L. Self & Jeffrey W. Thompson, ed., *An Alliance for Engagement: Building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2), pp. 151-154.

第二節 多邊機制

由於中日之間的關係複雜，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因此從中日雙邊的交往來看似乎不是十分順利。若從美日同盟與中國交往的角度來看，依照前述的分析，似乎也不是最佳的答案，原因在於美日同盟的發展方向將可能使中國倍感威脅，容易產生安全困境的狀態。於是就有學者主張，可以將中日的雙邊關係放在多邊對話機制中來處理，如此不但可以增進對話的空間，也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意見。因此，本章所要探討的主題就是多邊對話機制，首先闡述多邊對話機制的概念，其次將觀察各方對於多邊對話機制的態度。

一、多邊對話機制的概念

冷戰結束之後，多邊外交（multilateral diplomacy）逐漸在各種國際、區域和次區域的議題上發揮相當的功效並且受到學界的注意，受到重視的原因有幾個。²⁶首先，由於兩極對抗體系的改變使得主要強國願意透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處理有關國際和平與安全事務，1991 年的波灣戰爭使得世人與國際社會對於透過多邊外交與會議的方式來處理國際安全問題增加了許多期待與信心。第二，冷戰結束之後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發展，提供了區域多邊外交、會議或對話機制建立的機會，在區域內以多邊主義方式處理區域內的相關問題，尤其是經濟以及貿易問題等等，更讓各國可以藉此得到許多經驗和機會。第三，以多邊外交方式尋求國家之間的衝突或是內戰問題的解決，較以往增加了可行性和有效性，並且減少單一國家的責任與成本，在多邊解決的方式之下各國共同維護區域內的安全與衝突問題，則增加了多邊外交方式處理安全問題的可行性。

多邊對話機制的基礎是「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而多邊主義又是「新自由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下的一個概念，因此探討多邊主義必須探

²⁶ 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政治科學論叢*，第 11 期（1999 年 12 月），頁 163。

討新自由新制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接受現實主義的部分主張，認為國家也是單一行爲者，並且理性追求利益，不同於現實主義的地方在於，新自由制度主義主張國家之間仍有合作的可能，並且可以透過制度獲得利益。²⁷新自由制度主義中的「互惠」(reciprocity)也在多邊主義概念中表露無遺，而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多邊主義必須包含「合作」(cooperation)和「制度」(institutions)兩個概念，且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和正式組織(formal organization)也是制度具體的代表，於是 Robert Keohane 對多邊主義的定義為：3 個或多個國家政策合作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oordinating national policies in groups of three or more states)。

因此，多邊主義並不一定與區域主義相矛盾，也不一定是全球主義的代名詞；不同於後兩者以地緣及範圍為標準，多邊主義係指涉參與國家的數目和互動模式與過程為概念的核心，所以，多國(multi-national)並不一定是多邊，而必須在互動關係中展現 John Ruggie 所謂的多邊主義 3 大特性：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非歧視性或普遍性行爲原則(nondiscrimination or 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以及擴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²⁸此外，與國際組織不同的是，多邊對話機制的參與成員並不牽涉國家權力大小的問題。²⁹

多邊機制著重在特定議題領域的合作，若是發生想要在短期之內獲得利益的情形，或未來發展有可能對某一國家不利，或是國家無法得知其他國家的行爲時，多邊機制都會有被削弱的現象。³⁰此外，當多邊合作機制中某一國家突然表現出強勢欲望，希望可以獲得自我利益時，合作機制也將被破壞，尤其當這個行爲者是多邊機制中舉足輕重的角色時，情況就會更加明顯。加上若是維持合作機制的成本增加，都將減低多邊合作的意願。所以就有學者認為雙邊軍事協定對於

²⁷ Joshua S. Goldstein 著，歐信宏、胡祖慶譯，*國際關係*（台北：雙葉書廊，2004），頁 99-100。

²⁸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Summer 1992), p. 565-574.

²⁹ John Van Oudenaren, "What is Multilateral?" *Policy Review*, no. 117(Feb/Mar 2003), p. 35.

³⁰ Lisa L. Martin, "Interests, Power, an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4 (Autumn 1992), p. 789.

維護區域安全與穩定是較為有效的，而多邊機制是脆弱且缺乏效用的。³¹也由於多邊主義的安全對話機制常因此被批評過於脆弱，以及容易受到特定單一事件的影響而產生連鎖效應，使得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容易暴露在個別、雙邊或特定事件的影響之下。

然而，支持多邊主義的學者卻認為，安全性議題的多邊合作，不僅能涵蓋區域內國家共同合作來建構安全環境，更因為多邊安全合作過程涵蓋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rules）、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s）與國際統合等範疇，將可能透過相互對話、交換資訊、建立信心、互惠互信、預防外交等措施，發展出共同維護區域安全的機制與程序。³²也就是說，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將可能建構多邊性安全規範與安全機制，一方面增加國家間的互信，減輕安全之威脅感，降低或消除國家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二方面也由於規範與機制的牽制，而增加破壞現狀或侵略的成本；三方面則可以提供霸權領導的合法性（legitimacy）基礎。

在建構多邊安全機制上，國際建制更能表達這種多邊秩序關係達成的原因，在 Stephan Krasner 的定義中，國際建制是「某個國際關係範疇內，一套潛在或明顯的原則、規範、規則、及決策程序」³³。原則（principles）是指事實、因果和公正的信念，規範（norms）是行為標準的權利與義務，規則（rules）是對行為的命令或禁令，而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是創造或供給集體選擇的慣例。國際建制在國際與區域安全方面的貢獻普遍受到肯定，由於國際建制是「國際間藉由一個共同協調與合作之過程，進而確立在某些領域中的規則和決策程序，因而它是消除安全困境的手段」。對於多邊機制過於脆弱的批評，支持多邊機制的學者卻認為，類似的事件反而成為可以使多邊主義更有效的催化劑，

³¹ Gerald Segal, "Networked Security: Why We Do Not Need A New Framework for East Asian Security," pp. 488-505.

³² 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頁 161。

³³ Stepha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a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也就是經過類似事件的衝擊與調適，參與多邊機制的國家會協調或改變其本身對於多邊參與的政策與作法，而使得多邊主義的安全合作機制更能夠促進區域和平與安全，達成建立信心和透明度的目標。³⁴

二、各方對於多邊對話機制的態度

在東北亞甚至整個亞太地區，由於區域內存在的雙邊軍事協定與合作，一向是被用來維持國家安全與區域和平的重要作法，例如美日安保條約、美韓軍事同盟、美菲軍事合作，以及美澳紐軍事協定等，均是利用雙邊軍事合作做為維持區域內國家安全與整個區域的穩定。因此多邊機制不論是對話或者是政策的協調，相較於歐洲等國家，都是屬於較新的嘗試。而雙邊機制持續保持有效的主要原因，是基於美國在此區域的軍事存在之故，美國的霸權穩定是維持目前全球以及整個亞太區域的主要關鍵。而以下也試圖探討美、中、日三國對於區域多邊機制的看法。

（一）中國

中國 80 年代所奉行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揭示其外交方針是不以特定勢力為主要敵人，不加入任何大國及其集團，並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與各國發展關係，因此起初在安全領域中，對大國合作介入採取拒絕的態度。ARF 在創設之初，中國對於加入 ARF 也採取較為消極的態度，1993 年中國外長錢其琛受邀在東協外長會議中發表演說中就曾表示，ARF 應僅限於是一個意見交換的場所，亞洲的多邊安全合作，不應該採行歐洲安全會議的模式。³⁵在起初的時候，中國對於亞太多邊對話機制的認知與瞭解是相當存疑與猜忌的，主要是懷疑美國與其他相關國家可能透過多邊機制的安排，來進一步牽制與圍堵中國，中國

³⁴ 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頁 162。

³⁵ 高木誠一郎，「中国とアジア・太平洋の多国間安全保障協力」，**國際問題**，第 442 号（1997 年 1 月），頁 60。

甚至認為 CBM 措施將可能使中國解放軍的現代化受到延遲與阻礙。³⁶此外，中國也認為參與其中之後行動有受到限制的可能，並且可能進一步遭致破壞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的考量，特別是擔心台海問題與南海主權爭議成爲多邊安全機制討論的重要議題。

中國開始對亞太地區的多邊對話機制採取肯定態度主要有兩個面向，分別爲 1、欲藉此消弭「中國威脅論」；2、試圖藉由多邊機制來抵制雙邊同盟。首先，爲消弭「中國威脅論」。由於中國經濟的高度成長致使國防預算也逐年大幅增加，加上中國在軍事上不斷追求現代化且軍費極不透明，使得美國及日本等國家之間逐漸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聲音，若繼續消極面對多邊機制，很可能會加深周邊國家的疑慮，不利於與周邊國家發展政治與經濟關係。此外，中國的參與也明確讓周邊國家瞭解，中國並非威脅者，而許多亞太國家也希望將中國納入亞太多邊機制當中，以鼓勵中國成爲一個「負責任的區域強權」(responsible regional power)。³⁷爲了消弭各國的疑慮，中國不斷擺出和平的姿態，像是中國前外長錢其琛在 1995 年參加東協外長會議時，就曾全面闡述中國對解決南沙問題的基本立場，表示願同相關國家根據國際法及海洋法，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爭議，藉此展現中國的誠意。

其次，藉由多邊機制來抵制雙邊聯盟。中國參與亞太多邊機制後逐漸瞭解到，ARF 的決策過程由於由 ASEAN 所主導，因此具有共識決與非拘束性原則的特徵。中國也藉此機會將 ARF 轉變爲其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勢力，及預防日本軍事外交政策擴張的場所與工具。透過 ARF 的參與，中國能夠在以亞太國家爲主體的多邊安全機制與對話中，製造亞太權力分配現狀逐漸朝向多極體系發展的印象，來凸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影響和參與亞太安全政策的份量與角色。³⁸此

³⁶ Edward Friedman, "Good Will Lost in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vol. 159, no. 31(1 August 1996), p. 27.

³⁷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 38, no. 5(May 1998), p. 426.

³⁸ 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頁 178-180。

外，中國也透過 ARF 的議程與討論過程，與區域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建立制度性的溝通與接觸管道，並進而希望能夠淡化以美國和日本為主的軍事同盟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並且建立和取得在亞太區域安全事務上與美國相提並論或甚至相抗衡的立場與角色。

總之，隨著中國的逐漸崛起，其慢慢認知到多邊機制在亞太地區的功用，因此其戰略目的也出現變化，企圖使亞太地區成為多極的空間，藉此降低美國的影響力，因此中國的目的事實上是充分利用 ARF 等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的議事原則及特性，藉以形成對己有利的形勢。

（二）美國及日本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以多項雙邊關係與亞太地區國家建立軍事關係，美國也藉此成為亞太地區的安全中樞（hub），但是亞太地區存在許多爭議問題，例如北韓問題、台海問題、中印俄三國尋求區域內更高的地位、日本的「正常國家」目標、東南亞國家的種族衝突、武器擴散與恐怖主義等等，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的雙邊關係所必須面臨的挑戰。因此，有學者認為過去傳統的觀念對於這些區域難題已經難以有效解決，美國必須與亞太區域國家在共同的安全利益上合作，才能使諸如打擊恐怖主義、防治武器擴散，和災難救濟等問題得到較完善的解決，而這也有助於彼此的溝通，對發展區域安全更為有利。³⁹

美國對於亞太多邊對話機制開始時帶有懷疑的態度，但是很快就發現這其實與美國的戰略設計及利益十分符合，於是逐漸轉而支持並積極參與和介入多邊安全組織的對話與溝通過程中。美國對於亞太多邊對話機制的觀點，雖然逐漸採取積極支持並將其列為其亞太戰略設計的支柱之一，但基本上仍只是一個配角而已，因為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無法取代以美國為主軸的雙邊軍事聯盟，更無法取代美國真實的軍事存在及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因此，美國僅是希望能透過利用

³⁹ Dennis C. Blair & John T. Hanley Jr.,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4, no. 1(Winter 2001), pp. 7-17.

重要性日漸增加的多邊安全合作對話與機制，來加強區域各國軍事與安全政策與透明度，並協助增強彼此之間的信任，以期建立區域性解決衝突的制度性機制與程序。⁴⁰就如同前美國國防部長 William Cohen 於 1998 年 1 月訪問東南亞諸國時曾表示，美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所維持的雙邊安保合作關係，今後將朝多邊安全對話關係架構的方向努力，Joseph Nye 也強調參與亞太多邊安全對話是美國在此區域的主要戰略之一。

雖然多邊對話機制是美國的重要戰略，但是美國對於亞太多邊對話機制的政策與態度一直不是十分熱中，僅是以輔助的觀點來看待亞太多邊安全對話機制。⁴¹從美國角度而言，雙邊軍事協議與合作是美國藉以維護亞太地區安全與和平的主要政策，多邊主義將可能使美國的主導權受到影響，雖然美國並不相信多邊安全機制會取代或嚴重影響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戰略與架構，但卻可能增加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成本與複雜性，美國可說是不習慣在東亞地區以多邊方式處理安全問題。

就美國交往中國的政策而言，可以看出其實美國並沒有對多邊對話機制賦予太多的角色與重視，亦即美國對於中國的交往仍是以雙邊安全對話為主，而不願在多邊的架構下進行與中國的交流與軍事合作。⁴²這可以從雙邊高層政府官員互訪，到雙邊軍事合作措施的推動，看出美國的交往中國政策基本上是以雙邊架構進行。雖然亞太區域仍有像 ARF 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等一軌及二軌多邊對話機制的存在，但是這些機制由於參與的國家及彼此利益較為分歧，因此常有政治大拜拜的性質存在，在較具爭議性的議題上雖能有所談論，但往往無法得到重視及獲得充分的檢討。於是像 ARF 的部長會議最重要的功能，還是一種象徵性的亞太區域國家針對安全議題以多邊的方式交換意見與討論政策的形式，另外就是可以透過 ARF

⁴⁰ 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頁 174-175。

⁴¹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Winter 1993-94), pp. 35-77.

⁴² 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頁 176。

部長會議展現出區域國家對於亞太安全與和平的重視。⁴³對此，美國自然難以與中國就較具爭議性的議題進行對話，其功能自然也受到美國的懷疑。

日本的亞太政策深受美國影響，其國防安全的兩根主要支柱，一個是經濟力量及優越的工業科技，另一個就是和美國的同盟關係，以及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也因此，可以說日本和美國在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北亞有著共同的利益存在，特別是安全利益。因而美日雙方對於中國的態度也幾乎相同，大致上來說是交往大於圍堵，合作大於對抗。

雖然日本和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並不相同，像是美國追尋的是全球的領導地位，日本則希望能夠在亞太地區的安全議題上扮演正面的角色，但是美日之間由於在東北亞存在許多共同利益，例如在與中國的交往上，美日兩國就有著共同的目標，即希望中國能夠遵守區域的規範，並且對於區域的發展能有所助益。⁴⁴在這樣的態勢之下，就如同前面曾提過的，亞太地區雖有 ARF 及 CSCAP 等多邊機制，但是這些多邊機制多半無法針對中日之間的爭議來加以探究，實際效用相當有限。

如同學者 Michael Leifer 對於 ARF 的發展就抱持悲觀的看法，他認為 ARF 僅是亞太國家嘗試面對安全不確定性所採行的一個不完美的外交政策工具，而 ARF 抄襲 ASEAN 的低度建制（minimal institutionalism）與共識決的特色，只會製造出更多沒有成效與拘束力的決議。其次，ARF 雖然標榜是亞太安全為範圍，可是受 ASEAN 國家的影響，而較集中在東南亞問題的討論，例如對於韓半島問題就僅能在報告中表示關切。⁴⁵此外，Leifer 也指出中國在積極參與區域性安全對話機制之後，逐漸開始能夠影響甚至操縱 ARF 的進程序與議程。

⁴³ 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頁 168。

⁴⁴ Akiko Fukushima, "Multilateralism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China," in Benjamin L. Self & Jeffrey W. Thompson, ed., *An Alliance for Engagement: Building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2), p. 165.

⁴⁵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delphi Paper no. 302 (July 1996), pp. 31-60.轉引自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頁 171。

因而比較適合中日雙方來進行對話的東北亞地區，除了針對北韓核武危機存在的「六方會談」之外，並沒有其他多邊對話機制適合讓中日雙方甚至美國進行充分對話。對此也曾有學者指出為何東北亞缺乏多邊對話機制，Simon Duke 認為由於美國的長期經營且具有絕對主導的地位，因此美國習慣以雙邊關係來維持與東北亞國家的關係，是東北亞難以產生多邊機制的主要原因，加上東北亞國家的民族性、宗教、社會結構等等，不足以傾向多邊安全合作。⁴⁶他認為東南亞國家因為國內分歧問題，以及需要對抗外來的強權，因此需要發展多邊合作關係；反觀東北亞國家，皆因為更重要的因素而對多邊合作缺乏興致，也害怕因此而損害自身的利益。

總之，多邊對話機制的主要意義並非在於一朝一夕就能夠解決相關爭議，其價值在於提供一個彼此對話的空間，在多國政治對話框架下，在面臨和平抑或戰爭的選擇前，能透過和平對話方式探索解決的途徑，進而讓彼此間原本不睦的關係能夠有所緩和，如此就已經具有重大的意義。中日雙方爭議由來已久，在現行的架構之下，如能在東北亞地區增加多邊對話機制來增進彼此相互瞭解的機會，或許對於消除兩國間的疑慮將更有助益。

⁴⁶ Simon Duke, "Northeast As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9, no. 2 (Summer/Fall 1995), p. 323.

第三節 和諧世界與美麗國家

中國的崛起以及日本的「正常國家」，確實對中日關係造成挑戰，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許多競爭與對立，但是衝突絕對不是雙方所樂見的，因此兩國如何互蒙其利以避免兩敗俱傷，便形成了兩造都需面對的課題。中國領導層在 2006 年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中，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也象徵著中國的對外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日本則在首位戰後世代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後，也試圖邁向其「美麗國家」(美しい国)的目標。因此，本章將探討此兩者之間的基本概念，以及雙方尋求關係改善的可能性及作為。

一、基本概念

中國在 2004 年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接下來在 2005 年的亞非峰會上，提出和諧世界的理念，最後則在 2006 年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中，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國倡導建立和諧社會，並將此和諧理念延伸到處理國際事務的實踐之中，而形成了和諧世界的概念。就中國的角度而言，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一種「配合得適當而勻稱」的關係，包括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和世界的和諧。⁴⁷中國也對於和諧世界的意義加以闡釋，其主要內涵有：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

「決定」中強調，中國要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積極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環境、互信協作的安全環境、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等。此外，中國也要積極發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注重加強互利合作以實現共同發展。最後，要按照和平共處

⁴⁷ 「從和諧中國到和諧世界：中國內政和外交完美結合」，新華網，2006 年 10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09/content_5182124.htm〉。

五項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與世界各國發展友好關係，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⁴⁸

從「決定」中的這些內容可大致看出，中國在其逐漸崛起之後，所試圖要塑造的一個和平形象。從「中國威脅論」，以及西方學界也曾大肆討論過的「後興大國對現狀大國的挑戰」等等，都是中國崛起之後所必須注視的。而中國面對這些言論的反應，包括了江澤民時期的「新安全觀」，到後來胡錦濤掌政後提出的「和平崛起」，再到現在的「和諧社會」甚至「和諧世界」，其實所透露出來的訊息都是相似的，即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其主要目標是致力於國內的經濟發展，達成「小康社會」，並不會因此對外部環境造成威脅。因此「決定」中也提到，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提供堅強安全保障，具體作法則是試圖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以利發展，因此特別強調其睦鄰政策。

日本首位戰後世代首相安倍晉三，在其上任之前曾經發表一本名為「邁向美麗國家」(美しい国へ)的書，書中闡述了其對日本「正常國家」的看法。他認為由於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的結果，使得日本成為「非正常」的國家，戰後世代也無法繼承日本文化的核心價值，而在日本人重新認識及定位自身的過程中，也被抽離了「大和魂」。身為首相的他要使日本市民社會再現「日本精神」，並且在國際社會找回日本人的自信，依日本的國家利益來表達自己的主張，能夠恰如其份的扮演國際政治上的角色。對此，他認為日本人的國家信心的重建，並非戰前的「軍國主義」再現，也非重新追求東亞的宰制地位，而是要在國際間成為「值得信賴、受到尊敬與歡迎，且兼具領導能力的開放國家」⁴⁹。

中日兩國對於自身國家的定位就如同前述，而在這樣的定位之下，將會對兩國關係造成何種影響，現在仍在發展之中。但可以發現的是，橫亙在中日之間最

⁴⁸ 「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06年10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⁴⁹ 安倍晉三，*美しい国へ*（東京：文藝春秋，2006）；何思慎，「日相安倍的治國理念及對外政策評析」，發表於東亞形勢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06年12月18日。

大的障礙，導致中日之間難以好好對話的，便是兩國間的歷史問題，加上安倍晉三在政治理念上被認為是應派，外交上也繼續強化與美日同盟關係，這些都讓中國對日本存有疑慮。對於這些情況本篇論文也曾經探討過，在此也不再贅述，但是可以期待中日關係能夠有所緩和的關鍵，可能仍然必須藉由兩國在經貿上的共同利益，藉由這些共同利益的追求，至少能夠讓中日關係不致太壞，甚至也會有改善空間的存在。

二、中日雙方的合作面

相較於政治關係的起起伏伏，中日兩國在冷戰後的經濟關係稱得上是關係密切，可說是雙方最具代表性的合作指標。安倍晉三期待能夠在不損及中日經濟關係的情況下，來與中國解決各項政治以及安全上的歧見，並且藉由兩國緊密的經濟關係進而穩住整體中日關係，避免兩國走上衝突對立。⁵⁰安倍晉三也指出，與中國維持友好的關係對日本的經濟與安全均十分重要，因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對日本的景氣復甦有所助益，加上中國已從「世界工廠」逐步轉變為「消費市場」，這更能為日本的經濟帶來成長。⁵¹

中日兩國各自在對方的貿易中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兩國之間的人員來往也超過 400 萬人次，經濟關係更是逐漸加溫。從冷戰結束以來，中日雙方的貿易總額就不斷向上增長，除了在 1997 年以及 1998 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侵襲之外，近年來更是急速的增長，根據日本財務省方面的統計，2005 年中日貿易總額已經突破 20 兆日圓大關，2006 年更是突破 22 兆日圓（表 5-1）。

中日間日益密切的相互投資與龐大資金往來，或許可說是拉住兩國不走向衝突的重要關鍵，但是政治關係的低迷也會影響到經濟關係。對此，日本的財經界

⁵⁰ 安倍晉三，「新世紀日本の課題と戦略」，第 50 回輕井沢トップ・マネジメント・セミナー，2005 年 7 月 7 日，〈<http://www.jpc-sed.or.jp/mdd/50karuizawa/0703abe.htm>〉。轉引自何思慎，「日相安倍的治國理念及對外政策評析」。

⁵¹ 安倍晉三，美しい国へ，頁 152。

表 5-1：中日進出口貿易額統計表（1991-2006）單位：百萬日圓、%

| 年度 | 日本對中國輸出 | | 日本自中國輸入 | |
|------|-----------|-------|------------|-------|
| | 金額 | 增長率 | 金額 | 增長率 |
| 1991 | 1,156,768 | +30.9 | 1,913,713 | +10.6 |
| 1992 | 1,510,321 | +30.6 | 2,144,777 | +12.1 |
| 1993 | 1,911,297 | +26.5 | 2,278,026 | +6.2 |
| 1994 | 1,913,705 | +0.1 | 2,811,395 | +23.4 |
| 1995 | 2,061,960 | +7.7 | 3,380,882 | +20.3 |
| 1996 | 2,382,363 | +15.5 | 4,399,676 | +30.1 |
| 1997 | 2,630,721 | +10.4 | 5,061,673 | +15.0 |
| 1998 | 2,631,081 | +0.3 | 4,843,529 | -4.3 |
| 1999 | 2,657,562 | +1.0 | 4,871,462 | +0.57 |
| 2000 | 3,276,294 | +23.3 | 5,945,565 | +22.0 |
| 2001 | 3,764,447 | +14.9 | 7,025,845 | +18.2 |
| 2002 | 5,057,408 | +34.3 | 7,724,276 | +9.9 |
| 2003 | 6,635,482 | +31.2 | 8,731,139 | +13.0 |
| 2004 | 7,994,233 | +20.5 | 10,198,963 | +16.8 |
| 2005 | 8,836,853 | +10.5 | 11,975,449 | +17.4 |
| 2006 | 9,722,038 | +10.0 | 12,532,276 | +4.6 |

資料來源：「財務省貿易統計」，財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customs.go.jp/toukei/info/index.htm>〉。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亦憂慮若是中日高層溝通管道阻塞，可能加劇兩國間的誤解與矛盾，而這種「政冷」的現象若長期持續，將損害兩國的經濟關係。⁵²於是安倍晉三在其上任首相之後，積極著手重開中斷已久的中日領袖會談，而其想法也得到中國方面善意的回應，雙方皆認為應該透過領袖互訪及會談的方式來解決雙方歧見，並避免關係進一步惡化，最後安倍晉三在 2006 年 10 月出訪中國，為兩國關係的回溫揭開序幕，而溫家寶也預期將在 2007 年 4 月回訪日本。

中日關係問題十分錯綜複雜，對於問題的癥結可以劃分成內在層面及外在層面，內在層面主要是長期存在的歷史問題，如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及修改歷史教科

⁵² 何思慎，「日中關係：風波或坦途？」，*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10-11。

書問題；外在層面主要則是領土和主權爭議，以及雙方各自對彼此的疑慮等問題。

在這種複雜關係交錯之下，過去兩國一直都以選擇性的方式來解讀對方的行為，在關係良好時，便選擇雙方都有利的舉動來分析，以掩飾底下相互角力的情形，關係不佳時，則選擇對方不利的行為來批判，以掩蓋彼此畏懼對方的關係。⁵³而這種內外層面的問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一旦中日關係處於和平時期，則兩造自動會將內外作一切割，儘量避談歷史問題，而積極處理外在爭議問題；一旦關係緊繃，中日雙方都會將內外層面問題放在一起加以檢視，也因如此，使得中日關係一直擺盪在競爭與合作之間。難怪安倍晉三會認為應以「政經分離」的原則來處理中日關係，⁵⁴雖然緩和的政治關係有助於經濟關係的開展，但是為了避免因為政治問題影響到彼此的經濟利益，以「政經分離」來作處理，似乎是較保險的作法。

⁵³ 蔡增家，「安倍上台後對日中台三邊關係的影響」，**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11期（2006年11月），頁13。

⁵⁴ 安倍晉三，**美しい国へ**，頁152-153。

